

我省检察今年发放司法救助金逾1317万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徐笑余

实施跨省救助，“一案一策”，通过远程视频让救助对象“一次都不用跑”……25日，省检察院召开浙江省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新闻发布会。记者从会上了解到，今年以来，全省检察机关办理救助案件1090件1112人，分别同比上升52.8%和55.3%，发放救助金1317.2万元，同比上升20.24%，救助总人数和总金额均居全国前列。

远程视频传递司法温度

“我是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检察官，现在向你宣布《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》……1.5万元司法救助金将汇到你的银行卡上，请注意查收。”这是今年9月26日下午发生在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里的一幕。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和四级检察机关联动，杭州检察官跨省连线1500余公里外的广西梧州藤县检察院，向藤县村民罗某送达了司法救助决定。

作为外来人口流入大省，浙江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超2820万，在我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大量案件中，有不少当事人是外来务工人员。如何让因案致贫、因案返贫的他们和本地人一样平等地获得司法救助，成为浙江检察机关助力扶贫攻坚的一个着力点。

为减少当事人的往返奔波之苦，浙江检察机关以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为契机，积极探索远程救助模式，全力实现“让数据多跑路，让群众少跑路，甚至不跑路”的目标。借助远程视频接访系统，检察官不仅可以线上对外省异地救助申请人身份、账户信息等进行核实，救助款领取也不需救助对象上门签字。2018年以来，我省检察机关依靠远程视频技术，已开展国家司法救助80余起。

我省检察机关还把司法救助和扶贫攻坚工作衔接融合，出台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办法，全面助力打赢司法领域脱贫攻坚战。“今年以来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因案致贫的司法救助案件346件，救助困难群众393人，发放救助金586.55万元。”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检察长刘树枝说。

务副检察长刘树枝说。

“一案一策”提升救助精度

为了让司法救助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，我省检察机关以“一案一策”提升救助的精准度：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，对特别困难的，探索上下级、多部门联动救助，增加救助金额；对存在其他救助需求的，主动提供心理疏导、免费教育、最低生活保障、职业指导、就业介绍和其他临时性救助等。

在慈溪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刑事申诉案中，检察官发现，被害人刘某的一对未成年子女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刘某去世后，姐弟俩不仅衣食无着，还面临着辍学的可能。检察官随即来到刘某云南昭通的老老家，联合当地开展多元化综合救助。最终，姐弟俩被列入当地精准扶贫对象，有了自己的住所，高中阶段可享受每学期2000元的临时扶贫补助。

刘树枝说，下一步，浙江省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监督机制，完善司法救助信息共享，畅通申请渠道，探索多元化救助方式，推广信访代办制等经验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、在每一起司法救助中感受到人文关怀。

3名警员获评央视“2019十大暖新闻人物”

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

本报讯 日前，央视新闻发起的“2019十大暖新闻人物”评选结果出炉。根据网友票选结果，浙江公安共有3人获得殊荣，他们是舟山民警林剑、衢州民警徐帅军和辅警姜波。

“烧化的警服是英雄的勋章，你的身影是人民的依靠，临危不惧挺身而出，纵使烈火灼烧也不忘记自己的职责，这就是中国警察！”颁奖词写的是为保护群众，警服都被烧化的舟山岑港派出所所长林剑。

9月，在处置一起警情时，当事人点燃煤气致现场爆燃。当林剑踉跄着从火场出来时，他的头发已被烧光，面部一片漆黑，短袖警服胸以下烧尽，警裤也被烧成了碎片，双臂双腿和腹部的皮肤大片烧焦。经检查，林剑全身60%烧伤，其中3度烧伤30%，并有轻度吸入性损伤及双眼热烧伤，



需要经历多次植皮以及功能恢复的手术。

获奖后，林剑的感言质朴却情真意切，“每一名人民警察碰到这样的事情，都会勇于担当勇往直前。目前我正在努力康复当中，希望早日归队！”

另两名获奖者，是一张“网红”救援照片的当事人：衢州民警徐帅军和辅警姜波。8月，江山须江堤坝，徐帅军和姜波跳入江中，成功救回一名跳江轻生女子。这一幕，被摄影爱好者拍下，很快刷屏网络。



事后，两人谈及救人故事时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：“对于我们而言，这次救援是无数次警情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。换作任何一位民警、辅警，都会像我们这样做。”颁奖词说出了群众的心声——“一身警服穿在身，职责重任担在心。两位都说救落水人是常事，但这一伸手便是生与死的距离。人生挫折常遇寒意难免，不该用无价生命为冲动买单。为两位警察的义无反顾点赞，温暖的人永远带来春天！”

“污水靠蒸发”的村落变成了生活污水治理的样板

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条例将使浙江农村更美丽

本报首席记者 王素妮 通讯员 杭建宣

本报讯 走进杭州西湖区龙坞镇上城埭村，满目是翠绿的茶园，村庄雾气氤氲宛如仙境。倚着农舍庭院前的几张桌椅，喝上一口浓茶，大家的话匣子便打开了。“你肯定想不到过去的上城埭村是啥样的，有句顺口溜概括了：道路拧麻花，垃圾靠风刮，污水靠蒸发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便是一阵笑声。如今的上城埭村，已经成为农村治理生活污水的样板。12月25日，《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条例》宣传活动，就选在这里举行。

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浙江是全国首个全面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省份，2003年至今，全省90%以上的行政村都已陆续建成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，全省各级财政每年投入设施运行维护的资金达近7亿元。

“投入相当给力，但现实情况是，农村

地域辽阔，与城镇生活污水在来源、成分上等差异很大，处理设施的规模、工艺也不尽相同。”该负责人举例说，比如城市污水处理都是集中收集，而农村生活污水实行的是分散式处理；此外，村镇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，村民认识不到污水处理的重要性，“基建容易，后续管理困难，如果没有持续的监督和投入，设备很容易荒废。”

僵局即将改变。从明年1月1日起，我国首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领域的省级地方性法规——《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条例》将正式实施。《条例》对农村生活污水与处理设施的范、政府部门的建设与监管职责、运行维护单位的行为规范及其与设施使用人的职责边界、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等内容都作了明确规定，填补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的法律空白，也标志着我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步入了依法管理的轨道。

《条例》施行前，不少村民就直言已经

感受到了污水处理的重要性。杜天顺在上城埭村内经营一家茶苑，他说，得益于环境的改善，来村里的游客多了，农家乐、民宿生意也红火起来，“想开农家乐、民宿，就必须做好污水处理设施，验收通过了才能领出执照正式经营”。

在村民成一看，干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这件事儿，除了政府、运维单位，老百姓也得“发力”，“我注意到，《条例》中规定，村民应当在农房建设时，同步建成化粪池、隔油池等户内处理设施，并对这部分设施进行日常维护，村民也有权举报任何破坏农村生活污水设施的个人或单位。”

记者从杭州市建委了解到，2020年，杭州市将全部完成所有区县的设施提升改造任务，在此基础上，日处理规模30吨以上的设施全部实现标准化运维管理，并以贯彻实施《条例》为契机，总结杭州经验，推动杭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领跑全省，继续走在全国前列。

宁海开“法治诊所”解居民难题

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宋雪

今年，宁海县建起县、镇、村三级“法治诊所”，已累计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、服务上百次，解决各类矛盾纠纷78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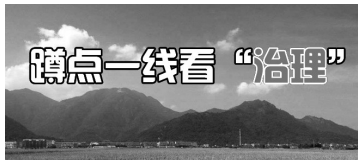
12月22日，在宁海县跃龙街道某社区，一场特殊会议正在进行。一方是“法治诊所”全体人员，一方是“求诊人”——小区物管公司代表和业主代表。“小区私搭乱建，占用公用通道；电梯长久失修，下水道经常被堵……物业公司到底管不管？”业主代表蔡某一口气提了8个问题。物业公司代表回应：“动用房屋维修基金要经业主同意，但房屋没出问题的业主不同意签字。”

双方争议较大，会议陷入了僵局。“法治诊所”负责人葛晓程指出争议焦点：“你们所说的问题，主要是房屋维修基金如何启动以及私搭乱建如何处理。”葛晓程与驻村法官、法律顾问等现场“诊断”后下了“处方”：业主委员会应协助物管公司做好业主工作，征得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后，可动用房屋维修基金。物管公司应在职权范围内及时制止私搭乱建行为。“以前他们单独都来过‘诊所’，我解答的他们不满意，今天我们把双方叫在一起，由诊所全体‘医生’‘会诊’，彻底解决问题。”葛晓程说。

据了解，“法治诊所”整合了村警务室、调解工作站和法务工作室，以驻村法官、辖区民警、法律顾问、村综治维稳干部为骨干，全日制“坐诊”，提供矛盾纠纷调处、法律咨询解答、法律援助申请、村内重大项目法治审查等服务。

“法治诊所”的“接诊”登记簿上，清楚地记载着“来诊”群众和“接诊人”的姓名、内容及办理结果等。“每周至少有一天由法律服务工作者‘接诊’。平时，如果村（社区）干部不能处理的问题，可与‘医生’联系，及时‘出诊’。”宁海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在接待村民过程中遇到复杂问题或一时难以解决时，工作人员先召开“所内圆桌会”，仍无法解决的提交县专家智库，组织专家“会诊”，结果交村“法治诊所”参考。

宁海还创新做法，推行“合法性审核前置”，在“五议决策法”的基础上，把“法议”作为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前的必经程序。作为“法治诊所”试点单位之一的岔路镇下畈村，开展了枫湖改造工程。根据“五议决策法”，这项工程要进行村民代表决议。而在决议前，工程交由“法治诊所”进行“诊断”，出具审查报告，排查出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和隐患，保障工程能顺利建设。同时，“法治诊所”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监督，确保工程合法合规。



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:0571-85310013